

【烟火人间】

温暖的名字

□杨丽丽

我没有小名，也从没正经起过大名。出生以后奶奶随口喊了一声“丽丽”，就成了我的名字，这既是大人们口中的“小名”，也是伴我一生的大名。

那时村里的娃大多就是这样，名字不用费心思琢磨，田埂上瞥见啥、灶台上撞见啥，随口一喊就定了终身。有的叫狗娃，图个好养活；有的叫麦穗，应着地里的收成；我这“丽丽”，许是奶奶那年春天在院子一角栽了丛野蔷薇，花开得艳丽，喊我时便沾了花的灵气。没人想着要再为我添个“大名”，户口本上登记时，村文书问奶奶我叫啥，奶奶笑呵呵地说“丽丽”，这两个字便顺理成章落上了纸页，成了我唯一的名字。

奶奶喊我从不用高声，粗粝的手掌在围裙上擦两下，朝着院子里疯跑的我扬一扬：“丽丫头，回家喝米汤喽。”声音裹着灶烟的暖，慢悠悠飘过来，我即便正跟伙伴们在麦垛上打滚，也会立刻从蓬松的麦秸里钻出来，裤脚沾着草屑往家跑。米汤是搪瓷碗盛着的，上面飘着几粒煮得软糯的玉米粒，奶奶在一旁看着我喝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：“慢点喝，没人跟你抢，我们丽丫头要长高高。”她从没叫过我别的，仿佛这个名字就是我天生的标识，刻在她心里。

后来我上学了，老师拿着花名册点名，念到“丽丽”时，我噌地站起来，声音脆生生的。同班有个邻村的丫头也叫丽丽，老师便笑着区分：“以后我就按照你们年龄大小，喊你们一个大丽丽，一个小丽丽吧？”我听后觉得很亲切——原来这名字不光属于我，还沾着乡里乡亲的熟络。放学路上，扛着锄头的大伯远远望见我，嗓门洪亮：“丽丫头放学啦？你奶奶在家蒸了红薯。”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的大婶也会抬头笑：“丽丫头，过来给婶子说说，学堂里学了啥新字？”没人问过我的“大名”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丽丽就是我的大名，是喊着顺口、听着暖心的名。

村西头的老槐树是听这名字最多的地方。夏天的傍晚，大人们搬着竹椅聚在树下乘凉，我和小伙伴们围着树干追逐打闹，叽叽喳喳中总能传来奶奶的声音：“丽丫头，慢点跑，小心摔倒了！”“丽丫头，来喝点水”——我便放慢脚步，坐在奶奶身边，小口地喝起奶奶为我准备的蜂蜜水。奶奶一边为我打扇一边絮絮叨叨：“丽丫头，你看你跑得满头大汗，一会可别这么疯了。”风吹过槐树叶沙沙作响，像是在应和奶奶的念叨。

一年秋天，我跟着父亲去镇上赶集，遇到了父亲的老同学。那人笑着问父亲：“这是你家丫头？大名叫啥？”父亲刚要开口，我抢先说：“我叫丽丽，这就是我的大名。”父亲笑着拍了我的头：“对，就叫丽丽。”那人也笑了：“这名字好，干净又响亮。”那天镇上人多，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，可我总觉得，没有比“丽丽”更顺耳的名字了。它就像村里的土坯墙、老井水，朴实又亲切，喊一声就带着烟火气的回应。

我长大了，去了城里读书、工作。城里人初听我叫丽丽，会愣一下：“这是大名还是小名？”我笑着说：“既是大名也是小名，我就这一个名。”他们便会赞叹：“真特别，比那些花里胡哨的名字好记多了。”这更让我觉得自己名字本身就带着故事，懂的人自然懂。

如今奶奶早已不在了，可村里的长辈们依旧亲切地喊我丽丫头。每次回家，他们还是会像小时候那样，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：“丽丫头，城里过得好不好？”“丽丫头，啥时候再来看看？”我知道，这个名字里藏着他们对我的牵挂，藏着我整个童年的记忆。它没有大名的正式，却比任何正式的名字都承载着更纯粹的情感；它没有华丽的字眼，却比任何精致的称谓都让我安心。它就像一根线，一头连着我，一头连着生我养我的村庄，连着那些爱我的人。

【私房记忆】

母亲的腌萝卜

□刘昌宇

寒冬腊月，当北风呼啸时，我总想起母亲腌的萝卜。那口粗陶罐子立在灶台角落，像位沉默的老者，守着岁月熬出的咸香静默不语。母亲的手艺是祖辈传下的，萝卜经她之手，便有了魂。

选萝卜是头等大事。霜降后的萝卜最甜，母亲总在天未亮时挎着竹篮往菜地跑。她蹲在田埂边，手指轻轻叩击萝卜缨子，像在听诊。“这棵瓷实，甜。”她挑的萝卜个个滚圆，青皮上沾着露水，切开来，莹白的瓤子透着水灵。邻居张婶总笑她：“老李家的萝卜，比选女婿还仔细。”母亲只抿嘴笑，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温柔。

洗净的萝卜要晾足时辰。母亲把萝卜切成半指宽的条，码在竹匾里，摆在院中晒着。冬日阳光稀薄，她却说：“晒足三天的萝卜，腌出来才脆。”我蹲在匾边，看萝卜条渐渐失了水汽，边缘微微卷曲，像老人干瘪的嘴唇。母亲不时翻动，动作轻得像怕惊醒了什么。有次我偷吃一条，她佯装生气：“小馋猫，晒不干就腌不脆！”可转身又塞给我一块麦芽糖。

腌萝卜的盐是自制的。母亲把粗盐炒热，混入花椒、桂皮，在石臼里捣成细末。这活计需耐心，她总说：“盐要细，才入味。”我蹲在旁边数她捣盐的次数，数着数着就困了，头一点点，撞在石臼上。母亲便用沾着盐末的手点我鼻尖：“小懒虫，又偷懒。”那盐香混着母亲的体温，至今留在记忆里。

腌制的日子选在月圆夜。母亲说月光能吸走萝卜的涩气。她将晒干的萝卜条一层层码进陶罐，撒一层盐，再铺一层萝卜，如此反复。最后封罐时，她总要念几句我听不懂的“咒语”，说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。封好的陶罐放在灶台边，每日早晚各开一次，用干净筷子翻动。这活计母亲从不假手他人，说：“手上有汗气，腌萝卜会坏。”

头三天最难熬。萝卜在罐里发酵，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，像在说话。我总凑近罐口闻，却被母亲轻轻拍开：“小鼻子，闻多了会打喷嚏。”她每日擦拭罐身，动作虔诚得像在供奉神明。第四天清晨，她揭开罐盖，一股咸香扑鼻而来，夹着淡淡的甜。母亲夹出一条，咬得“咔嚓”作响：“成了！”那声音清脆如裂帛，在我心里荡开涟漪。

腌好的萝卜呈琥珀色，透亮如水晶。母亲总在饭前切一盘，摆在青花瓷碟里。萝卜条上泛着油光，咬一口，先是咸，后是甜，最后是辣，三种滋味在舌尖交织，最后又和谐地融为一体。父亲就着萝卜喝粥，能喝两大碗。我则喜欢把萝卜条卷在煎饼里，咬下去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满口生香。母亲看我吃得欢，眼角的皱纹便舒展开来，像绽放的菊花。

有一年冬天，母亲病了。她躺在炕上，还惦记着腌萝卜。“罐子该开盖了……”她虚弱地说。我学着她的样子，却总不得要领。腌出的萝卜要么太咸，要么太软，没了那股脆劲。母亲尝了一口，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吃了半碗粥。第二天，她硬撑着爬起来，重新腌了一罐。她的手抖得厉害，撒盐时洒了一地，却固执地不肯让我帮忙。那罐萝卜腌好后，母亲的脸颊凹陷下去，像干瘪的萝卜缨子。

后来我离家求学，母亲总在包裹里塞几包腌萝卜。我拆开油纸，咸香便扑鼻而来，室友尝了，都说好吃，问我在哪买的。我骄傲地说：“我母亲腌的。”咬一口，咸香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甜，那是母爱的味道，是任何添加剂都调不出的深情。

去年春节回家，发现母亲不腌萝卜了。她说：“老了，手抖，腌不好了。”可我知道，她是怕我吃多了伤胃。我偷偷翻出她的陶罐，发现罐底积了一层盐霜，像岁月的痕迹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，腌了一罐萝卜。母亲尝了一口，眼睛突然亮起来：“脆！真脆！”她像个孩子似的笑了，眼角的皱纹里盛满骄傲。

如今，母亲的腌萝卜成了我记忆里的珍宝。每当我咬一口，咸香便在舌尖绽开，那味道里，有阳光的温暖，有月光的清冷，有灶火的炽热，更有母亲一生的温柔。这世间的美味，终不过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牵挂，是岁月熬出的深情，是永远割不断的亲情。

母亲的腌萝卜，腌的是时光，是爱，是永远都尝不够的家庭的味道。

【朝花夕拾】

“加急航班”

□丁展

前几天在书店听南京大学苗怀明教授关于《四大名著》的讲座，苗教授妙语连珠的讲解令人沉醉。散场后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那些幽默的讲解在脑子里打转，忽然就撞进了一段回忆里——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朱先生。他上课也是这股子劲儿，课堂里永远飘着笑声。我后来爱读爱写，多半是源于他。

算来二三十年了，可关于他的那些趣事，还是一闭眼就清清楚楚。那时候朱先生已是副校长，却不离教学一线。最绝的是朱老师讲文言文，再拗口的句子到他嘴里都活了。记得讲《扁鹊见蔡桓公》，他把古文拆成家常话，讲到“桓侯体痛，使人索扁鹊，已逃秦矣”时，他忽然戛然而止，脖颈青筋微露，双臂平举作螺旋桨状，嘴里“突突突”模拟直升机轰鸣，末了一拍大腿：“瞧见没？扁鹊这是坐加急航班跑的，晚一步就得背锅！”全班笑得前仰后合。这“加急航班”的梗，我们笑了一整个学期。

讲《少年闰土》时更有意思。读到刺猹那段，朱老师干脆从讲台后走出来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右手攥成个小拳头当钢叉，胳膊一伸一收，活脱脱就是课文里“项戴银圈，手捏一柄钢叉”的模样。那股机敏专注的劲儿抓得极准，我们坐在下面，仿佛真看见月光下的瓜田，闰土正屏气盯着猹。如今再读这篇课文，脑子里还是他当时的样子。

朱先生上课特别投入，常常讲得忘了时间。有时候下课铃响了，他浑然不觉，我们也听得入迷，没人舍得打断。有一次，夕阳斜照门框，把生物老师的影子拉得老长。这位生物老师早已站在门口多时，大概是看我们全班都听得津津有味，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在门口等。最后还是朱先生自己板书时瞥见了，赶紧停住，连连作揖道歉。生物老师笑着摆手的样子，至今想起来仍觉温暖。

后来，朱先生的女儿考入北京大学。我家中至今还挂着当年送我的一幅毛笔字，用的是颜体楷书，力透纸背，落款格外有趣，写着“北大女生之父”，每次看到都忍不住笑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字的墨迹淡了些，但先生传递给我的文字生命力，却在岁月里愈发清晰。那位站在讲台上模仿刺猹、喊着“加急航班”的先生，从来没在我心里淡去过。他让方块字有了心跳与体温，让遥远的篇章住进了我们的生活。这份最初的、生动的欢喜，或许便是文学与教育最本真的模样。

